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18.03.009

“东亚新秩序”语境下台湾与朝鲜文学中的殖民地主体重构及中国认知

刘惠莹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 在“东亚新秩序”日本殖民语境下,“中国”言说大量涌现。由于朝鲜历史上是独立的国家,朝鲜文人并未真正将“中国”纳入“东亚”视野,仅是利用“中国”符号明确“朝鲜民族”的概念,重塑一个理想化的“朝鲜主体”。而台湾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人对“中国”表现出高度关注和连带意识,其背向帝国、明确民族立场的过程也正是确立对大陆的文化、血缘认同的过程,对他们而言,“中国”是与“日本”相对立的、本原的“自我”,其想象的“台湾主体”先天包括“中国”这一更为本原的层面。由此看来,主张日本殖民统治末期萌生了自觉的“文化独立性”、要求政治独立的“台湾主体”,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关键词: 台湾; 朝鲜; 东亚; 中国;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8)03-0074-10

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构想可以上溯至幕末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的“征韩论”和胜海舟、樽井藤吉的“战略联盟论”,前者主张武力进攻朝鲜,将从西方列强处受到的损失转嫁给周边邻国;后者主张同中国、朝鲜平等结盟,共同对抗西方列强。可见,“东洋-西洋”的对立图式是“东亚新秩序”提出的基本图式。然而在1941年12月8日以前,日本主要在东亚内部扩张其侵略势力。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英对日宣战,中日战争扩大为太平洋战争,“东洋-西洋”的对立图式才浮出表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更有效地榨取殖民地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战争,日帝更加紧了对殖民地台湾与朝鲜的精神控制。日本文学报国会派遣作家赴台湾、朝鲜作“文学报国”巡回演讲,要求台湾、朝鲜作家作为日本代表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殖民地文坛内部,一方面,将殖民地半官半民、较为松散的文人协会改组为几乎网罗了所有文学者、控制严密的国策宣传组织;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出版物的管制和审查。

除了严密的统治与监视,在台湾和朝鲜从事写作的殖民地作家还受到强制动员,被要求写作宣传日帝国策的文字。但是,正如霍米·巴巴指出的,殖民地对帝国话语的模仿(mimicry)同帝国文本之间存在许多差异^①,台湾与朝鲜的殖民地文学绝非如日帝策划的那样,纯然是为日帝歌功颂德或宣

收稿日期: 2017-12-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二十世纪东亚抗日叙事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15ZDB09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日本殖民统治末期(1937-1945)台湾与朝鲜抗日叙事比较研究”(编号16YJC751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惠莹,女,文学博士,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东北亚殖民地文学比较研究。

^①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86.

传日帝政策的奴化文学。即便或多或少有粉饰太平的文字，绝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抛弃自己的民族立场，苦恼着殖民地所独有的现实问题，反刍着殖民地人与日本人之间的鸿沟。殖民地文本与帝国文本之间产出差异的过程也正是殖民地主体重构的过程。在这点上，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韩国学界21世纪之后的殖民地朝鲜文学研究主要是探讨殖民地主体如何重构及其形态。金在湧主张殖民地朝鲜文学从发生之初即是立足于主体性（subjectivity），但他忽略了殖民地文学同帝国文学的差异，以致得出殖民地朝鲜文人内化了日帝的法西斯思维的结论，同金哲、李庆勋代表的“法西斯文学”论合流了。^①尹大石运用后殖民理论的“杂交性（hybridity）”概念，具体指出殖民地朝鲜文本在重述（模仿）帝国话语时呈现的差异，认为这种“分裂的主体（agent）”才是殖民地主体的真正形态。^②韩寿永和方珉昊则提出了更为积极的“殖民地主体”，指出殖民地作家如何在自己的创作谱系内自主重构、颠覆日帝言论，还原了殖民地文本对日帝言论的拮抗。^③

无论持哪种观点，韩国学者对“殖民地朝鲜主体”的探讨都紧紧围绕殖民地朝鲜与日帝的关系展开，这也正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时代主题。而在台湾学界，“殖民地主体”的提法却完全曲解了当时的时代主题。如叶石涛、彭瑞金、陈芳明、游胜冠等学者将“殖民地主体”阐释为相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来殖民强权”、自觉着台湾的“文化独立性”的“台湾主体”，成为目今台独派要求台湾政治“自主性”、“主权独立”的呼应。对此，本文将专门探讨台湾与朝鲜文学中的殖民地主体重构及其与中国认知的关系问题。笔者所谓“殖民地主体”，是指殖民地台湾和朝鲜文学均在积极地想象一种理想化的“台湾/朝鲜”形象，它不但摆脱了帝国秩序的束缚（因而包含了对日帝的反抗），而且具备“现代性”等殖民地作家希望赋予故土的种种理想特征。由于殖民地文坛上的“中国”言说及文学形象集中出现于“东亚新秩序”殖民语境中，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为1938年11月3日日本近卫内阁发布“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之间，选取分别活跃于该时期的台湾与朝鲜文坛并集中关注“东亚”、“中国”话题的吕赫若、李光洙等作家作为具体的文本分析对象。

一、日帝“东亚新秩序”中的“台湾”、“朝鲜”和“中国”

从冈仓天心到北一辉再到大川周明，其亚洲论的演变体现了日本的“亚洲主义”逐渐退化为帝国主义侵略理论的过程。1938年11月3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正式提出“以日满支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的“东亚新秩序”。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谈话中首次使用了“大东亚共荣圈”这一表述。^④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几经更正，1942年2月28日，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明确为包括“日满支及从东经90度至东经180度之间南纬10度以北的南方诸地，其他地区视形势变化而定”。^⑤1942年10月，东条英机专设大东亚省。

在日帝的“东亚新秩序”中，台湾和朝鲜分别被定义为“南方基地”和“大陆兵站”，即连接西南太平洋和中国大陆的跳板。1895年6月，日军进驻台北，正式建立起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开始

^① 金在湧 《合作与抵抗》，首尔：昭明出版社，2004年，第26-30、77-94页；金在湧 《亲日文学的内在逻辑》，首尔：亦乐，2003年，第11-49页。

^② 尹大石 《1940年代“国民文学”研究》，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0-28页；尹大石 《殖民地国民文学论》，首尔：亦乐，2006年，第159-198页；尹大石 《阅读殖民地文学》，首尔：昭明出版社，2012年，第11-24页。

^③ 韩寿永 《亲日文学的再认识》，首尔：昭明出版社，2005年，第17-108页；方珉昊 《日帝末期韩国文学的谈论与文本》，首尔：Yeok，2011年，第323-360页。

^{④⑤} 庄司润一郎 《日本战争名词关联问题考》，《防卫研究所纪要》第13卷第3号，2011年3月，第45页。

实施“北守南进”政策,台湾的战略地位受到重视。1900年发生“厦门事件”,日本南进政策遭遇挫折。1905年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日本确立了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一带的势力,开始将“大陆经营”定为国策,侵略重心转移到朝鲜和中国东北一带。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朝鲜作为“大陆兵站”的战略地位日显重要。1936年8月南次郎任朝鲜总督,在“鲜满一如”的基础上提出“内鲜一体”,加速了对朝鲜的同化。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东,再次开展南进政策,此后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确立了北守南进的格局,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再次浮现。

值得注意的是,日帝的“东亚”说中,台湾和朝鲜并非“东亚”的主体,首先必须经过“同化”过程成为“日本”的一部分,才能通过“日本”这一介体到达“东亚”。换言之,台湾和朝鲜仅具有“准东亚性”,而不完全属于现在时的“东亚”,其东亚化进程由日本化进程决定。“东亚”——或说“东洋”——具象化为“日本”,以“古典”、“道义”和“王道”为特质;其对立立面是“西洋”,以“现代”、“物质”和“霸道”为特征。“中国”由于接受了“西洋”的如上特征,成为“反东亚”的存在,对华战争即是为了纠正“中国”,以将“中国”真正纳入“东亚”。如此看来,在日本的“东亚新秩序”中,存在着绝对的“东亚”——日本,和绝对的“非东亚”——“美英鬼畜”,在这两极之间,“台湾”和“朝鲜”是亟需自觉排除非日本性的“准东亚”的存在,而“中国”则是既呈现“非东亚”性,又亟需纳入“东亚”的存在。这一理论显然漏洞百出。下面将具体分析台湾与朝鲜的“东亚”言说及“中国”认知。

二、可变的符号: 殖民地朝鲜文坛上的“中国”

在朝鲜,日本的“中国”言说主要侧重于将“中国”塑造为反衬日本与朝鲜共性的“他者”。日本鼓吹,朝鲜上古时期与日本“同祖同根”,新罗以后由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侵袭才疏日亲华。然而,殖民地朝鲜文人对“中国”的他者化并未呈现出持续性。他们笔下的“中国”并不具备确切、固定的内涵,仅仅是用以重构“自我”的工具。

朝鲜文人在探讨“东亚”时,并未将“中国”纳入视野。朝鲜在历史上是独立的国家,其“东亚”论述根本上是在探讨当时最重大的国际关系课题,即与日本的关系问题。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日帝提出“一亿国民”的口号,同时用于日本本土、台湾和朝鲜。所谓“一亿国民”,是指三地人口的总和。^①但是,朝鲜文人在论及“一亿国民”时,却仅指朝鲜和日本,不包括台湾。

(中略)今天我们所说的“国民文学”的“国民”是“一亿国民”,即七千五百万左右的内地人(日本人——引者注)和两千五百万左右的朝鲜人。^②

对朝鲜文人来说,“东亚”问题即是同日本的关系问题,无论“台湾”还是中国大陆都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在梳理对日关系的过程中,通过整理“国家”、“民族”、“国民”等现代概念,他们反而更明确了民族立场,清晰地意识着朝鲜民族的民族身份,要求与日本人同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

印贞植的《东亚的再编与朝鲜人》在“内鲜一体”框架内论述了“东亚协同体理想”。他认为“东亚的再编”就是要实现“内地民族与朝鲜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彻底的平等”,因而作为“朝鲜的民众”和“高丽的子女”发声,要求“国民权利”,即“和内地民族同样的政治资格”。^③

^① 根据日本官方的数据,1942年底日本本土人口为72 880 000人,台湾(包括在台日本人)为6 427 932人,朝鲜(包括在朝日本人)为26 361 401人,共约1亿人。近藤劬一编《太平洋战争下的朝鲜和台湾》,茅崎:朝鲜史料研究会近藤研究室,1961年,第2页。

^② 牧洋(李石薰):《关于新事物》,《东洋之光》,1942年6月,第98页(本文作者译)。

^③ 印贞植《东亚的再编与朝鲜人》,《三千里》,1939年1月,第52-64页(本文作者译)。

尹致昊的《东亚的新建设与内鲜一体》则客观体现了“东亚”殖民语境反过来刺激殖民地民族意识的悖论。他先是指出,随着“日本帝国进驻大陆”,朝鲜“三千里江山”的种种优点凸显出来,“几乎堪称完美无瑕的‘国土’”;另一方面,他着眼于“朝鲜民众”这一主体的“天然体质”及其历史,强调同“大和民族”结合时要“保存、继续我们体质中固有的传统良风美俗”。从尹致昊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朝鲜文人的“朝鲜”意识非但没有抹消,反而明确具化为“国土”和以生理、历史、文化为内容的“民族”,更接近现代的民族概念。^①

如此,在探讨“东亚再编”的过程中逐步明确“朝鲜民族”概念的现象非常普遍,体现出殖民地主体重构的过程。从这点来看,日本殖民统治末期的朝鲜文人虽看似接受了日本的统治,实际上与安重根等爱国志士借宣传“东洋主义”要求韩国独立是殊途同归的。

由于殖民地朝鲜文人的“东亚”探讨以“朝鲜”为中心展开,其“中国”言说也根本上围绕着朝鲜。金允植和 Jung, Jong-Hyun 都曾详细论述过朝鲜文人如何凭借塑造积极的古代朝鲜形象颠覆日帝的文化秩序。^②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引导朝鲜“堕落”的元凶,往往被塑造为腐朽、落后的负面形象。乍一看去,这似乎是对帝国言论的重述,但实际上却解构了日本的统治逻辑。下面是李光洙论述创氏改名的例子:

我们目前的姓名是崇拜支那的祖先的遗物。“永郎”、“述郎”、“官昌郎”、“初郎”、“所回(岩)”、“伊宗”、“居七夫”、“黑齿”才是我们古代先祖的名字,“徐罗伐”、“达久火”、“斋次巴衣”、“霍尔高德”、“俄恩奈”才是我们从前的地名。这些地名人名统一改为支那式不过是六七百年以来的事罢了。

现在我们是日本帝国的臣民了。我认为,比起用支那人的姓名来,用日本人的氏名才是最自然的事。^③

南次郎总督和朝鲜总督府对创氏改名的解释是:由于大和民族和朝鲜民族自古以来同祖同根,因而理应实现从外形到精神的彻底统一,为此,朝鲜人有必要弃用中国“姓”,创设日本“氏”。^④表面看来,李光洙文字中对中国的排斥和否定似乎与日帝的言论并无二致,但“中国”这一“他者”中却投射有“日本”的影子——基于“现在我们是日本帝国的臣民了”,从而得出应改用日本氏名的结论,同出于盲目的崇华心理而采用中国姓名同样荒诞,均有悖于民族的独立自主精神。如此一来,看似拥护日帝创氏改名政策的结论就同对盲目崇华历史的批判具有了等价性。

这一现象也见于李光洙的小说文本。《少女的告白》中,朝鲜少女听了日本人排斥“中国”、强调日鲜同质性的“同祖同根说”,一方面萌生了对本民族血统和历史的强烈自觉,将现在的朝鲜人放置在“惠慈”、“晁征”、“李退溪”代表的“贵重、宏大”的古代朝鲜形象的延长线上,抒发了重构一个“更加有力、更加闪亮”的朝鲜主体的渴望;另一方面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京都呼为游地,将对“中国”的排斥扩大到“日本”。

(中略)

我悄悄为自己将京都视为“异乡”而道歉,为将内地人视作与己无关而忏悔。我感到安心,好像是到自己祖先的故乡、和自己有着血缘联系的地方游玩一样。

^① 尹致昊 《东亚的新建设与内鲜一体》,《总动员》1939年6月,第21-23页(本文作者译)。

^② 金允植 《日帝末期韩国作家的日语书写论》,首尔:首尔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119页; Jung, Jong-Hyun 《东洋论与殖民地朝鲜文学》,坡州:创作与批评社,2011年,第54-74页。

^③ 李光洙 《创氏与我》,《每日新报》1940年2月20日(本文作者译)。

^④ 朝鲜总督府法务局编 《氏制度的解说——何为“氏”及如何创氏》,京城:朝鲜总督府,1940年2月10日,第4-6页,第15-17页。

(中略)

我相信在父亲同乡们的血液里,仍存留有曾经奔流在惠慈、县征、李退溪血管里的血液,相信他们贵重、宏大的精神能够苏醒,比过去更加有力、更加闪亮。^①

由于殖民地朝鲜文人的“中国”形象背后隐藏着对“朝鲜”的思考,“中国”不过是为重构“朝鲜”而动员的符号,因此,“中国”并非必然作为朝鲜的“他者”出场,根据需要,随时可以转变为投射出朝鲜形象的镜子。这时,可以很容易发现殖民地朝鲜文人所设想的“他者”其实是“日本”。

所谓“对大陆的拟帝国主义欲望”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解释。“拟帝国主义欲望”是持“法西斯文学”论的韩国学者提出的重要概念,意指殖民地朝鲜文人将日帝对朝鲜的帝国主义欲望内化于己,产生了对“中国/满洲”的“拟帝国主义欲望”,想象朝鲜人可以在“中国/满洲”跃升为日本帝国的“一等国民”,其对“中国/满洲”的负面视角就是这种“拟帝国主义欲望”的结果。^②但是,“中国/满洲”恰恰也是证明在帝国秩序中朝鲜人绝不可能摆脱“二等国民”身份的空间。^③如果将部分朝鲜移民对灌溉用水和农耕地的物质需求普遍化为全体朝鲜人的“拟帝国主义欲望”,恐怕有失公允。应该注意到,朝鲜文人赋予“中国”的“贫穷”、“不洁”、“无知”、“贪婪”、“无道德”、“无秩序”等负面形象不仅同他们感知到的日本人的朝鲜观相一致,同时也正是他们力图改造的朝鲜自身的缺点。^④因此,就朝鲜文人的状况而言,其对“中国”的负面视角主要基于对“朝鲜”的负面认识。也就是说,朝鲜文本中“中国”的负面形象与其说是殖民地文人内化了帝国主义视线的结果,不如说是他们出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将对自我的负面认知投影在“中国”上,通过极力批判这一负面自我,曲折地表达出更新为理想化的朝鲜主体的欲望。

李光洙小说中的朝鲜人形象大部分是亟需“民族改造”的负面形象,唯一例外的是《唯有心与心相遇》(《绿旗》1940年3-7月)。这篇小说中没有负面的朝鲜人形象,取而代之的是负面的“支那人”。不洁、无知、贪婪的“支那人”与李光洙其他小说中的“朝鲜人”全无二致。由于这样的“支那人”形象是朝鲜人应该舍弃的负面的自我,而并非“他者”,作者的视线虽然带有批判,却并不对立。“支那人”敌我不分的愚蠢的善良让人同情,同时也反证了“日本人”满口仁义道德却彻底贯彻“怀柔”政策的伪善——真正的“他者”是“日本”而非“中国”。

这点在1944年以后创作的小说中更为明显。随着日本呈露败相,殖民地朝鲜作家的民族立场清晰地浮现出来。此时,“中国”成为“朝鲜”形象的补充,而“日本”逐渐固定为“他者”。李光洙的自传体小说《四十年》(《国民文学》,1944年1-3月)中有两段关于“支那人”的叙事,一段是“支那人香师”,一段是“岛上的生活”。两段叙事中,“支那人”均以正面形象出场,成为刻画朝鲜传统文化之古雅、朝鲜人品格之刚正的补笔,并作为受害者与殖民地朝鲜相重合。

“支那人香师”中塑造了“王先生”的形象。“王先生”在“我”幼时寄居在祖父家,“称呼祖父为‘父亲’,对我则像叔父。”这其实是将“支那人”描写为朝鲜家庭的一员。即便他的辫子也没有让年幼的“我”感到突兀,反而唤起了对“卖竹梳的全罗道老光棍汉”的亲切回忆。“我”从“王先生”那里得到“用纤细的活字印就的书”、“好墨”、“在黄色、猩红色纸上绘着梅竹的便笺和

① 香山光郎(李光洙):《少女的告白》,《新太阳》1944年10月,第30-31页(本文作者译)。

② 可参阅金哲《没落的新生——“满洲”之梦与〈农军〉的误读》(《尚虚学报》第9辑,2002年9月,第123-159页)、李庆勋《满洲与亲日浪漫主义》(《韩国近代文学研究》,2003年4月,第92-119页)、尹大石《1940年代“国民文学”研究》(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82页)等。

③ 关于这点,中国东北百姓在称呼日本人为“太君”的同时,私下里称呼朝鲜人为“二太君”的事实很具启发性,暗示着在日本帝国的秩序中朝鲜人是无法越过日本人的位次的。

④ 可参阅李春园(李光洙):《民族改造论》,《开辟》,1922年5月,第45、55-64页。

诗笺”，并将这些化入对传统朝鲜的记忆。“王先生”善制香，作者借此详尽地介绍了朝鲜传统的香文化，却并无只言片语及中国的香文化。因此，“王先生”虽以“中国人”出场，却被作者用于渲染朝鲜传统文化的优雅。另外，作者写道“即便如今，每每忆及祖父，眼前就会浮现出王先生在马提灯前制香的样子。”可以说，“王先生”是作者对“祖父”的补充说明。鉴于文中多次暗示1900年前后在朝鲜逗留过“相当时日”的“王先生”其实是名政治活动家，那么，“王先生”离开之后不得不匆忙迁居“龙岩”荒岛的“祖父”也很可能与当局持不同政见。即便不能简单判定“祖父”为“抗日”，但至少可以说，辞世于1910年的“祖父”形象中显然隐含了作者对1910年之前独立的朝鲜的怀念。

小说对日本人异质性的刻画佐证了这点。同一回出场的日本人形象与“支那人”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王先生”“朝鲜语说得非常好”，融入朝鲜传统文化毫无违和感，表现出与朝鲜的同质性；相反，日本人“井上”的出场从一开始就伴有不安和诡异的气氛，他乘着让年幼的“我”大吃一惊而深感不安的“奇特的船”突然出现，“发音奇特的朝鲜语”和朝鲜人无法交流，并且单方面地将点心、香烟、日语教材等异物扔给“我”，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尤其是，为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他在深夜悄悄测量水深，一夜之间涂白龙岩山顶，以便日军登陆。这些都让朝鲜人陷入深深的恐惧。像这样，随着民族立场的浮现，“中国”成为朝鲜书写的补笔，而“日本”的异质性凸现出来。

“中国(朝鲜)—日本”这一对立图式直接通向作者对自己亲日活动的反省。第二回“岛上的生活”一节中，作者提出“末世”、“隐士”等意象，并且设置了如下场景：

“世道一乱，贤者都会隐居起来，叫做‘独善其身’。你……”祖父不说了。

后来我想，或者祖父也是一名隐士也说不定呢。

祖父“你……”后面没说完的话是什么呢？我很想知道，却没有勇气问。^①

从这段意味深长的描写中可以很容易读出作者对自己亲日行径的深刻省察，作家的这一问题意识在下文更加明显。“我”被自称“平壤镇卫队上等兵”的人所骗，代他写了一封以“平壤镇卫队大队长陆军参领”名义向中国渔夫征收一千两黄金的文书，事先并不知道那张文书是用于打劫中国渔民。“上等兵”召集起十来名混混，硬拉着“我”，一同袭击了中国人村落。虽然“我”偷偷给中国人送了信，回到家仍旧遭到“祖父”的毒打。“祖父”的诘问——“你可知罪”“你成了强盗的帮凶了！”——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作者作为“亲日作家”沦为民族罪人的现实。在这里，“中国”与“朝鲜”作为受害者相遇了。

综上所述，殖民地朝鲜文人根本上并未将“中国”纳入视野，其“中国”形象不过是用于重构“朝鲜”主体的可变符号，本身并不具备确切、固定的内涵。当需要塑造积极的古代朝鲜形象颠覆日帝殖民逻辑时，“中国”作为腐朽、落后的形象出现，此时的“中国”作为“他者”，投射有“日本”的影子；他们对“中国”的负面视角则结合了对自我的负面认知，流露出自我更新的欲望；随着日本呈露败相，殖民地朝鲜作家的民族立场清晰地浮现出来，“中国”转而成为“朝鲜”形象的补充。

三、本原的自我：殖民地台湾文坛上的“中国”

较之朝鲜文人对“中国”的漠视，殖民地台湾文人对“中国”表露出显而易见的高度关注和明确的连带意识。为使研究更具说服力，本文不以赖和、张我军等出生于日本领台初期、曾经接受汉文教育的一代作家为研究对象，而是选取系统地接受了日本殖民教育的吕赫若、叶盛吉为研究对象，探

^① 香山光郎（李光洙）：《四十年（第二回）》，《国民文学》1944年2月，第55页（本文作者译）。

讨他们的中国认知,看他们是否视“中国”为日本一样的“外来殖民强权”、视台湾文化为有别于中国文化的“独立文化体”。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东亚”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才成为公共话题,比朝鲜要晚得多。^①这是因为,对台湾文人来说,“东亚”课题从最初就包含了对“中国”的考虑。当时台湾人中汉族占90%以上,在侵华战争背景下,要作为日本国民与同一血统的中国人作战,这一事实并不容易接受,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日本”的对立图式被“东洋—西洋”所取代,意味着此前台湾在祖国和宗主国之间难以平衡的难题终于有了解决的可能。台湾文人的“东亚”言说多围绕这点展开。

黄得时强调太平洋战争的性质与中日战争截然不同,表现出对中日战争的抵触和“东亚十亿民”团结成一体的期待:

(中略)

从某种意义上说,支那事变有如兄弟相阅,是早晚必须解决的,而大东亚战争是确立东亚共荣圈的战争,是解放东亚十亿民的战争,是建设世界新秩序战争。^②

张文环也热烈宣称,由于设立了“东亚”这个公分母,不但此前的“种种龃龉”和“不符合国策的事件”——台湾人的反日立场——可能得到解决,因侵华战争而低落的情绪也昂扬起来:

迄今为止,内地人和台湾人都各自考虑着各自的立场,因而产生了种种龃龉,甚至是不符合国策的事件。加之支那事变的发生,(中略)台湾人陷入低落的情绪。然而随着大东亚战争的爆发,很快就能将英美赶出亚洲、洗雪长期以来的耻辱。(中略)不单日本青年,全东洋的青年都振奋了起来,这是自然的。^③

与朝鲜文人将“东亚”缩小为“七千五百万左右的内地人和两千五百万左右的朝鲜人”相反,台湾文人有意将“一亿国民”扩大至“东亚十亿民”,强调“东亚”的一体性。他们希望借扩大概念模糊中日对立的心理同中国沦陷区文人非常相似,暗示了二者之间的同质性。也就是说,即便到了日本殖民统治末期,虽然政治、文化上已被人为与大陆割裂近五十年,台湾文人仍具有对大陆的连带意识。

扩大空间概念虽能一时掩盖台湾人的民族身份认同苦恼,却并不能帮助他们获得“日本人”的身份认同。1943年中期以后,日本对台湾文坛的监视更为严密,台湾作家切身体会到当局对台湾人的不信任,更明确了自己的民族立场。反映在文本中,1943年中期以后,台湾小说中出现了放弃“成为日本人”的探讨、回向民族立场的微光。

下面将重点探讨殖民地台湾文人的“民族立场”与“中国”的关系。游胜冠认为,包括启蒙知识分子在内,殖民地台湾知识分子的“汉民族”概念都是从属于“日本”这一“母概念”的“子概念”,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是“日本国”中的“汉民族”。^④但是事实上,殖民地台湾文人的汉文化认同往往归向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可以说,台湾文人明确民族立场的过程也正是其确立对大陆的文化、血缘认同的过程。

日本殖民统治末期活跃于台湾文坛上的吕赫若1914年生于台中,其祖父在地方上小有名望,参与皇民奉公会等日帝控制下的地方组织。吕赫若本人自入学起即接受日本殖民教育,1940年赴日学习声乐,1942年因肺疾返台,当年七月即加入《台湾文学》,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和戏剧活动,是典型

① 在朝鲜,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就已出现“东亚”言说。

② 黄得时《大东亚战争与艺术家的使命·雄浑豁达的心态》,《台湾艺术》1942年3月,第101页(本文作者译)。

③ 张文环《不沉的航空母舰台湾——关于海军特别志愿兵》,《台湾公论》1943年7月,第74页(本文作者译)。

④ 游胜冠《殖民主义与文化抗争》,台北:群学,2012年,第574页。

的日殖时期台湾知识分子。虽然早在发表于1935年的《牛车》中，他已流露出对殖民现代性问题的省思，但并未对“日本=文明，台湾=野蛮”的殖民逻辑提出直接质疑。1942年返台以后，吕赫若日益表现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自觉。1942年3月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读了《台湾风俗志》，我们好像忘记了去了解我们自己风俗的优点，拯救她吧！”^①每逢月未月初、传统节日、家人生日等重要的日子，他必定在日记中同时标注旧历日期，并详细记载传统的岁时饮食、岁时风俗、民俗信仰、节日文化。《庙庭》（《台湾时报》1942年8月）、《风水》（《台湾文学》1942年10月）等小说中，他花大篇幅浓墨重彩地描写台湾的传统风俗，并同其他台湾文人讨论台湾话的纯度受到日语影响的问题，积极搜集台湾传统民谣唱片。但是，对台湾文化的强烈自觉并非意指台湾文化具有“独立性”，恰恰相反，吕赫若试图从“中国”寻找台湾文化的本原。

1943年2月10日的日记中，吕赫若记道“买了很多书，都是关于支那的，我觉得通过这些书可以认识台湾生活。”同年4月25日，他又写道“必须更努力地学习整个的东洋哲学和道德，必须正确体认日常生活、活用于好作品上。”对此，6月7日的日记作了进一步阐明“今天买了《诗经》、《楚辞》、《支那史研究》三本书。学习支那不是学问，是我的义务，是为了了解自己。回归东洋吧！想写立足于东洋的自觉的作品。”^②显然，“学习支那”是吕赫若“回归东洋”的途径，他的“东洋”与日本的“东洋”含义不同，以“中国”为具体表征；另一方面，“学习支那”也是“认识台湾生活”的途径，“中国”是台湾人的“自己”，是正确认识台湾日常生活的根本。这样看来，“回归东洋（中国）”和“回归台湾”仅是同一过程的不同层面，如果说后者属于日常层面，前者才是本原。基于这种观点，吕赫若有意识地大量购读中国书籍。通过他的日记可以知道，1942-1943年间，他购读的与中国有关的书籍有《红楼梦》《还魂记》《桃花扇》《北京好日》《从诗人看支那文化》《好速传》《今古奇观》《三国志》《乾隆御赋》《支那人气质》《东洋哲学夜话》《满支习俗考》《骆驼祥子》《支那的演剧》《支那思想研究》《诗经》《楚辞》《支那史研究》等。

同样的现象在更新一代殖民地知识分子叶盛吉身上也可以发现。较之吕赫若，叶盛吉自幼接触到了更多的日本文化。他1923年出生于台北，父亲属于殖民统治下的第二代台湾知识分子，受日本教育，在日本人经营的制糖公司供职。叶盛吉在中日双重文化的氛围中长大，根据他的自叙，直到1941年赴日留学之后，他才开始萌生“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的苦恼，民族意识开始觉醒。1943年11月，在宿舍的辩论会上，他作了“论传统”的演讲，演讲中强调“我们对自己的传统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加深对于自己传统的敬意，同时，还必须怀着尊重其他传统那样的宽宏度。”表现出对民族传统的自觉和对日帝野蛮践踏台湾传统的不满。手记中他进一步补充“任何民族，无论这个民族是怎样处在落后状态、不懂科学、不讲卫生，而他们的故乡，他们的习惯，对他们来说，都是绝对的东西。即便有一天他们接触到其他更高级的文化、文明，或者会一时地陶醉其中，而不久，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也还要怀念自己的故乡，怀念过去的生活和习惯。”^③这显然是对“日本=文明，台湾=野蛮”的殖民逻辑的反抗。

萌生了民族文化自觉的叶盛吉一方面重拾台湾话，费力搜罗《台湾语辞典》《日台会话大全》等工具书；另一方面向大陆同学勤学中文，表示“对中国话产生了极大兴趣。现在要开始读《红楼梦》了。”^④可见，当时具有民族意识的殖民地台湾知识分子并不认为“台湾”与“中国”相斥，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关注包括“台湾”这一日常层面和“中国”这一更为本原的层面。同吕赫若一样，叶

^{①②} 吕赫若《吕赫若日记·（昭和17-19年）手稿本》，台南：台湾文学馆，2004年，第77、50、129、176页（本文作者译）。

^{③④} 杨威理《双乡记》，陈映真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09年，第47、67-68、144-148页。

盛吉也有意识地阅读有关中国的著作,包括《近代支那思想史》《孙文传》《北京好日》《三民主义解说》《支那四千年史》等。他对中国电影发生深刻的共鸣,反复感叹其“人情味”,反复吟味“民心不死,则国不亡”的主题;偶然看到中华民国国歌,他一丝不苟地将歌词和乐谱抄在日记中,并在歌词上注上注音符号;十月十日中华民国建国纪念日,叶盛吉特意在日记中标注“双十节也”;终于他向好友倾诉“真想去大陆。”^①

显然,在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知识分子民族立场的苏醒几乎必然归向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于台湾文化已遭日帝破坏,他们需要回向“中国”寻求台湾文化之根本,对他们而言,“中国”非但不是外来的“他者”,而是与殖民者相对立的、本原的“自我”;“台湾主体”的重构并非建立在支离破碎的殖民地风景之上,而是首先要“回归东洋(中国)”,确立本原的自己。

吕赫若的小说《清秋》是如实呈现殖民地台湾文人这一思路的作品。小说主人公“谢耀勋”是台湾中产阶级的子弟,于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东京一所医院里工作了三年。祖父命他回台开设医院,在故乡成家立业。“耀勋”向来尊敬祖父,也很向往故乡台湾安静平凡的日常生活,顺从地回了故乡。然而,当看到周围的人纷纷响应“国策”奔赴东南亚时,“耀勋”开始怀疑自己没能把握这个时代的潮流,怀疑自己不应拒绝响应“国策”。幸而故乡台湾美丽的自然风景和祖父的“浩然之气”抚慰了他,他每日照料祖父的菊花,阅读中国诗人的传记等中国古典文献,随着时光流逝,他逐步认识到别人的南方行实为无可奈何之举。小说以祖父的菊花全部盛开、“耀勋”感到充实欣悦结尾。

《清秋》是吕赫若在日记中呼吁“回归东洋吧!想写立足于东洋的自觉的作品”之后开始构思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清秋》的构思和《石榴》(《台湾文学》1943年7月)的创作几乎是同时的,而后者是一篇宣告放弃“成为日本人”、彻底回归民族立场的小说。这再次证明,吕赫若所谓的“回归东洋”实为回归民族立场,含有对日帝的反抗。正因为此,作者将“耀勋”的归乡与一系列次要人物的奔赴东南亚设定为对立图式——作者拒绝日帝给台湾定义的“南方基地”,他的“台湾”另有其内涵。

通过“祖父”这一人物形象,作者暗示了“台湾”与中国大陆割不断的亲缘纽带。“祖父”曾在清朝的科举中考取“文秀才”,也就是说,曾是中国官方文化机构的组成部分;他通读中国古典著作,通身焕发着中国“读书人”的“风流(风采)”。可以说,“祖父”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象化。作者借“耀勋”兄弟之口高度评价这样的“祖父”,称之为台湾日常生活“幸福的根本”。从这里可以看出,吕赫若的“台湾”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老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直接作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与新一代台湾知识分子构成“祖孙”传承关系,共同承继“中国”的精神。换言之,吕赫若的“台湾”绝非独立于“中国”之外,而是彻头彻尾位于“中国”之内的,甚至可以说,他的回归民族立场暗含有回归中国的隐秘愿望。

上文已经谈到,作者一方面肯定“耀勋”对“台湾”的选择,一方面委婉否定台湾人的“南方行”,实际上是反对日帝对“东亚”的规划,含有同日帝“东亚”言说争夺文化霸权、对抗日帝的意味。小说中,台湾人的“南方行”无一不意味着日常生活的破灭:小饭馆老板娘的儿子“黄明金”由于生意难以维持,不得不将寡母托给舅舅家,自己从军。“江有海”被强征为野战医生后,当地失去了唯一的儿科医生。“耀勋”的弟弟“耀东”的情形更加耐人寻味——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东京的药专,作为唯一一名合格者被大阪一家制药公司录用,但由于台湾人的身份,他只能在宣传部门做广告,不能进入核心的制药部门。“耀东”选择去南方是“因想着与其在大阪宣传药,还不如运用自己擅长的语言去南方工作,反而更符合生活的真谛。”同朝鲜文人的“中国/满洲”一样,台湾文人

^① 杨威理《双乡记》,陈映真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09年,第133-149、180页。

的“南方”也不是帮助他们在帝国秩序中掌握主导权的空间，而是从一开始就承袭了帝国日本与殖民地台湾之间的矛盾，并让这一矛盾进一步明晰。

与朝鲜方面不同，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知识分子的“中国”形象有着具体、固定的内涵，即本原的自我。在所谓的“台湾主体”重构过程中，“中国”是他们探求本原“台湾”之所在，也是“台湾”的终极指向点，他们想象的“台湾主体”先天包括“台湾”这一日常层面和“中国”这一更为本原的层面。

结 论

殖民统治末期，日帝在台湾和朝鲜的文学政策几乎并行展开，两地的殖民地文学同期呈现出共同的母题和极为相似的问题意识。吕赫若和李光洙分别活跃于同期的台湾与朝鲜文坛，是殖民地文坛上颇具影响力的中心人物，其代表作品紧紧围绕当时殖民地的公共话题，体现出对本民族血统及历史、文化的强烈自觉，表露出逸脱、消释帝国霸权的殖民地主体意识。但是，朝鲜文人的殖民地主体意识最终凝聚为对一个承袭本民族历史命脉并克服了自身缺点、更为强大的“朝鲜”的渴望，而台湾文人民族意识的苏醒则归向“中国”。当然，不能否认当时殖民地文坛的状况十分复杂，同时存在一些已完全丧失民族立场的“亲日/皇民作家”，对他们的探讨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

殖民地朝鲜文坛的殖民地主体重构是在政治层面上展开，逐渐树立一个现代概念的“朝鲜民族”，向日本帝国要求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仅是被利用的可变符号；而殖民地台湾文坛的殖民地主体重构并未进入政治层面，仅是在文化层面上，试图重塑遭受日帝践踏的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被视为台湾传统的本原，对台湾知识分子体现出强大的向心力。殖民地台湾知识分子视“台湾”为“日常”，“台湾”不具有本原性，因而也绝不具有文化上的“独立性”，更遑论政治上的独立要求。这当然是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具有独立政权和独立历史的个体，通过与殖民地朝鲜的比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二者的区别。

(责任编辑: 陈 颖)

tion of “the Grand Justic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traits relations, “Taiwan independence” separatists are more likely to promote “legal independence” by means of “interpret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lonized Subject and Perception of China in Taiwanese and Korean Literature on the Background of ‘New Order in East Asia’

LLU Hui-ying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discourses about China emerged on the background of ‘New Order in East Asia’. Korean intellectuals’ ‘East Asia discourses’ didn’t focus on ‘China’ because Korea w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They used ‘China’ to clarify the conception of ‘Korean nation’, and to reconstruct an ideal Korea. In the case of Taiwan, as a part of China,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Korea.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East Asia discourses’ included the consideration of ‘China’. When they were deviating from the empire and clarifying their national position, they were establishing their identity as Chinese. For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China’ was opposite to ‘Japan’ and was their primitive ego, and their ideal ‘Taiwan’ included ‘China’ innately.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views of ‘Taidu literature’ is baseles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ems of Lai He and the intellectuals’ Yimin feelings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CHEN Mei-xia

Abstract: After 1895, Taiwan intellectuals faced not traditional Chinese dynasty change, but the global modern colonial aggression. Their Chinese poems also present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Lai He was known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Taiwan”. Paradoxically, his Chinese poems shared the Yimin discourse with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intellectuals used traditional thought resources and forms of expression to convey the Yimin feelings,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 and the loyalty to the motherland. According to the Yimin behavior pattern and poems writing of Taiwan intellectuals, the Chinese Yimin discourse was also enriched.

Study on the Dilemma and Significance of Exploring “Governing Body” in QingLi Dynasty’s Confucian Classics

YAN Yun

Abstract: During the QingLi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nfucian scholars focu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Kingly Way, and argued about the treatment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Wang Dao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ing Body” theory of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of the dynasty. The question that they faced is what is the fundamental meaning of “the Way of the First King”. Sun Fu and Shi Jie’s summed it up as “the Great Middle Way”, while Hu Yuan expounded it as the study of “Ming Ti Da Yong”. Sun Jue, Hu Yuan’s pupil, developed the teacher’s theory and established the relationship of “Wang Dao” and “Saint Theory”. Examining the trajectory of the QingLi Dynasty’s Confucian Classics’ “exploring political philosophy”, it was found that the focus of Confucian scholars’ attention had the tendency of shifting from “Outer King” to “Inner Holy”: when they were exploring the theory of “Governing Body” of Wang Dao’s politics, another attempt was made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ing Body” and the study of